

俄 国 和 欧 洲

〔美〕 兹·布热津斯基

(原载美国《外交季刊》1984年4月号)

戴高乐在西方的政策，是以他的两个信念为依据的，一是西欧的新的经济结构能够长期坚持下去，一是美国有力量遏阻苏联进攻西欧的任何军事行动。如果可以說四十年代末期欧洲的基本动力是出于对苏联侵略的恐惧，那么在六十年代初期就是出于自信。这种自信作为起点，戴高乐于是著着进逼，力图削弱美国在欧洲大陆的政治影响，而代之以法德的协调关系。由于德国的重新武装有着种种限制，更重要的是由于其中所包含的意义与政治因素，他就能够蛮有道理地自认为法国必然要行使这种关系中的政治领导权（或许还有军事领导权）。为了确确实实达到这个目的，也为了加强欧洲对美国军事政策的抗衡（至少加强到可以使美国不得不顾及其中所蕴涵而牵涉进来的程度），戴高乐就着手要把法国变成一个大国。按照他的观点，这一作法在长远意义上的重要性，足以补偿美国暂时孤立甚至不得人心的脆弱而有余。只有如此他才可以挫败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大西洋共同体的想法，照他看来，那样一个大西洋共同体的政治与军事权力几乎完全会由华盛顿和伦敦控制。而一个紧密地一体化的而又听命于这样的“外界”控制的西欧，正如他在1963年9月28日所说，就会成为听命于“两个外国霸主中的任何一个”的“既无灵魂，又无脊梁，又无根基”的欧洲。

戴高乐在位以来，这样一个欧洲就会变成一种在战略意义上开始不相称的将害冲突的欧洲。两个超级大国的距离，照他那样看来，是太近了。而且，如果美国继续在冷战中全部

分（至少就最近的将来而言），而满足于停留在易北河畔，忙于巩固自己的后方。而美国，不管它的领导者们怎么说，则是接受这种分裂局面的。戴高乐在1963年7月29日曾十分公开地说明了他对上述这种看法的信念，他说：“美国从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以来对苏联就没有什么可要求的了，现在，看到它面前出现了达成谅解的前景。结果就有了盎格鲁—撒克逊人同苏联之间单独进行的谈判，从关于核试验的有限协定起。这些谈判看来还将扩大到其他方面，特别是欧洲问题，而迄今，这些谈判都是在没有欧洲参加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显然是同法国的观点相违背的。”戴高乐肯定美国在冷战中分裂局面供资之始，曾有新首脑“在冷战的阴影中”使东西方在欧洲的关系更趋分裂。并且说：“我在其他场合也说过，如果这一天到来，法国准备就欧洲的和平时局和前途提出建设性的建议”。

至于这些“建设性的建议”可能是什么内容，戴高乐已经做过几次暗示。简单来说，这些建议包括把东欧和俄国吸引到一个更大的欧洲共同体里面，这个共同体以共同文化与历史遗产为基础，它的地理范围这位法国领袖在1959年3月25日的一篇演说中曾予以划定。他在那篇演说里提出了“直到乌拉尔的欧洲”的口号，并联系着这个口号发出了要求树立欧洲新秩序庄严的动听的呼吁：“我们这些生活在大西洋和乌拉尔之间的人，我们欧洲，同欧洲的女儿——美洲一起，同亚洲的国家和非洲的富源一起，我们

么我們不把我們的一部分原料、制成品和食品，把我們的一部分科学、技术和經濟人員，一部分汽車、輪船和飞机集中起来，用于消除貧困、开发資源、援助不发达国家人民的工作呢？讓我們来这样做吧！这絲毫不是为了要他們充当我們的政策的走卒，而是为了改善生活条件，为了爭取和平。这比那些导致世界毀灭的領土要求、思想意識上的企图和帝国主义野心，不知要好多少！”

从那时以后，戴高乐常常提到这种想法。他显然把这种想法的实现看作共产主义国家内部漫长的转变过程的终极，这个过程或许已因中苏冲突以及欧洲和共同市场的越来越大的吸引力而加速。因之，戴高乐发展了同中国的关系，他希望对苏联的新的包围甚至会使苏联更急切地想变成欧洲的一部分。

尽管戴高乐和德国有着紧密联系（他把这种联系当作独立的欧洲行动的支柱），他一直希望通过减少东欧人对德国人再度“东进”的恐惧的办法，逐渐加速把俄国并入欧洲的过程。在这方面他已经比华盛顿走得更远一些。他已经看到，承认奥得—尼斯河的德波现行疆界的永久性，是把波兰拉回到欧洲集团的必要条件^①。而且显而易见，由于波兰的地理位置及其目前与俄国的联系，在俄国最终重回欧洲的任何过程中，波兰都会成为关系重大的一个环节。

[illegible]

表示他们乐于看到法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更重大的、而且更为独立的(就是反美的)角色。而戴高乐的领导显然成了朝这个方向向前推进的动力。《真理报》特别追述苏联对于美国,它曾给戴高乐在大战期间的民族解放委员会以有力的支持;赫鲁晓夫在1960年8月访问巴黎的前后都曾强调他对这位将军的敬意以及对他们“友善”关系。与此同时还做了活跃法苏贸易的努力,在五十年代后期法苏贸易不断有所增长,并在1958年第一次超过了1913年的水平。在苏联看来,法国的壮大显然是和美国在欧洲势力的衰微成正比的。

苏联虽然在一个时期内曾希望法国的再度强盛,但它对于法国对东欧感兴趣有任何迹象都十分敏感。因此,在1958年初阿登纳访问巴黎之后,赫鲁晓夫曾在一篇特写(访问记)中特别抨击戴高乐—阿登纳公报中关于把“尽可能多的欧洲国家”最终包括在一个欧洲联邦中去的一句话。照赫鲁晓夫的说法,这意味着戴高乐与阿登纳“想必已失去了一切现实感。才当真地指望任何在东方冒险的成功”。两天之后他又向一个德国记者重述这些话。

苏联的这种恐惧随着法德联盟的形成而更加强烈起来。到1960年从苏联发言人所用的谨慎的措词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已重新估计了法国所起的作用,并开始觉察到其中包含着一种长期的政治危险。法国就被说成不仅企图搞核独裁,还在鼓动核武器的扩散,并且是由“早已丧失一切现实感的架不住的人物在领导着”。到1962年,法国被说成是和核国际紧张局势的一个主要障碍。戴高乐的德国之行被正式抨击说这是有损于东欧共产主义政权以建立一个“欧洲岛”的谈判(原稿被引用)的阴谋的一部分。苏联还将通过国际分享核武器的渠道合作来加以反对。1963年法国拒绝签订禁核试的之

后,这种谴责达到了最高峰。

戴高乐的计划既然在他自己的追随者看来都是含糊不清的,在苏联看来大概也是含糊不清。可是苏联可能认为这种含糊不清,再加上对俄国和东欧自作主张的强烈语调,要比英美对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已经人所共知的、基本上固定的“兴趣”更为危险。因此,苏联对美国在欧洲地位的态度变得更加矛盾复杂了。从政治观点来看,以大陆欧洲为基地的可能出现的法德挑战,比起美国主持的大西洋共同体来,是一个更大的威胁。可是从经济观点来看,美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当然是远为更大的威胁,而从军事观点来看,甚至更其如此。如何协调这两种看法越来越成为苏联外交的主要课题。到1963年,他们看来多少不那么急迫,譬如不像中国人那么急迫地希望看到美国在政治上被排除于欧洲大陆之外。相反,苏联人倾向于试图施展手腕使美国采取和苏联共同支持欧洲分裂的立场,希图借以稳定现在的分割局面,或许最后还会为苏联外交创造新的政治机会。——在这方面,1962年末苏联在古巴问题上和美国对抗一事,可以被认为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转折点。它使苏联人确信在目前时期他们的手段不足以实现他们的目的。而苏联以逼迫柏林为手段企图在政治和军事上在欧洲实现突破的政策是注定要失败的,而且事实上已经发生了反作用。美国不顾退让,苏联在古巴施加压力的结果是加强了法国和德国内部的“铁腕”势力。要是,如果苏联力求建立以华盛顿接受欧洲分裂局面为前提的苏美和解,这样会削弱德国的法德联盟,并造成西方联盟内部的新的破坏性的裂痕,甚至还可能最终导致柏林新的分裂和新的条约。克朗布林一方面显然竭力只好忍受法德的敌视态度,另方面则力求努力巩固法德联合不能得到美国在政治和军事上的支持。因此,法德还是力求保持和加强由他们自己的力量的

计划，理由是这样就会加强德国的政治和军事地位。可是，多边核力量搞不起来就会使戴高乐的政策对波恩更有吸引力，甚至结果还会造成一支德国的独立核力量，或至少是法德联合核力量的出现，这种局面会有利于法德的政治野心，而法德的政治野心比美国的打算更加不利于苏联对中欧的控制。这样，苏联反对多边核力量反而对巴黎有利，并且使苏联在如何处理越来越复杂的对欧洲关系问题上更加进退维谷。

俄国和美国的合作可以保持欧洲的分裂，但是不能担保有朝一日俄国不会想利用欧洲对于美国现行政策的失望，美国毕竟是俄国真正的全球范围的对手。因此，对美国来说，和俄国一道赞助欧洲的分裂乃是危险的。欧洲联俄反美的局面也只有在欧洲感到美国在出卖欧洲利益因而对美国的领导怨恨不满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因此，这就必须有三个先决条件，就是美苏在联合承认欧洲现状的基础上达成协议，这就是苏联目前正在追求的目标。即使这种先决条件，欧洲—俄国的合作能否实现，也是值得怀疑的。因为美国和平与自由主义和欧洲的反共主义也有很大的距离。美国对欧洲反共主义，即使不反对，对苏联国家利益和西方势力，也是有害的。这才是最有意义和最持久的联合美国和欧洲两方长远利益的办法。中苏分裂正符合于这种做法。[1950年11月16日]

现在苏联正在变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容易为欧洲的挑战所打动。在过去，俄国对欧洲的态度摇摆不定。一方面，骄傲自大地把自己说成是第三个罗马，后来又把它说成是一种全人类的新意识形态的策源地，而在另一方面却有着对西方的一种根深蒂固的自卑感，并且有着模仿西方的愿望。俄国知识分子把侵略感和一种（通过模仿也就是“西化”）消除自满感而努力结合起来。经

